

卢敏 著

# 天南地北山东人

第二卷



述殷切乡情，说百态人生，  
立英才传记，扬齐鲁美名。

山东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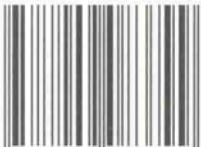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Success Stories  
of the Shandongers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209-08379-9



9 787209 083799 >

定价：239.00元(共三卷)

这部《天南地北山东人》是用了二十年完成的大型纪实作品的精萃。  
二十年间，作者的足迹遍及全国及五大洲的二十多个国家，采访了近八百位山东籍游子，完成了这部堪称“山东游子大传”的作品。  
本书入选人物的标准近于苛刻：1.对国家和民族有重大贡献者；  
2.知名度极高者；3.有非同寻常经历的传奇色彩者；4.所在领域的国际或国内翘楚。  
故此，《天南地北山东人》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自明。

卢敏  
著

天南地北山东人

第二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爆炸传奇

郑哲敏 山东济南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3年1月18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此隆重举行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向郑哲敏院士颁发了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郑哲敏，这是个对公众来说，绝对陌生的名字，而他从事的爆炸力学，甚至早已消失在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专业目录上。

郑哲敏的获奖，正所谓大爆冷门，也让这位一生都默默无闻于实验室的老科学家和他的工作在他88岁的耄耋之年曝光在世人面前。

获奖之后的老科学家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衣着随意，朴实自在，笑容中透着亲切和孩童般的天真，丝毫让人感觉不到他是中国力学界德高望重的泰斗。

获了这么一个大奖，老科学家却觉得心情很复杂。

郑哲敏：“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获了这个奖感到很惶恐，有荣誉就有责任，我这么大年纪还能为国家尽多少力，总觉得好像欠了什么完不成。”

郑老每天时间都安排得很满。

郑哲敏：“我起床后自己洗衣服，晾衣服，把做家务当做

锻炼，上午到力学所上班半天，下午在家上网至少两个小时，天气好就出去散散步。”

年届九旬，还能有这样好的状态，人们都很感兴趣郑先生的“长寿秘诀”。

郑哲敏：“我主要是多走路，不大吃大喝，睡觉基本正常，看病‘勤快’。”

陈维是与郑老同事四十多年的老友：“郑先生长寿最大的秘诀是心理健康，他心无旁骛，从不在乎名利。”

郑哲敏也有严厉的时候。

李世海（学生）：“有时候我参加社会活动多，他就会严肃批评我，告诫我要潜心研究。”

郑哲敏：“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能沉下心想远一点的事，只考虑近利，必然影响他的成果和决心。”

郑哲敏告诫自己的学生，搞科研很艰苦，很枯燥，要经得起寂寞。而他自己身体力行了一辈子。

郑哲敏 1924 年 10 月生于济南，他的父亲出身贫苦，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著名的“亨得利”钟表行的合伙人。父亲虽经商取得很大成功，却不希望孩子们经商，他结交的朋友圈，多是医生或大学教授，也希望郑哲敏和他的兄妹都能好好读书，认真做事，成为真正有出息，对国家有作为的人。

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南迁，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郑哲敏和哥哥郑维敏是为数极少坐飞机到昆明报到的新生。

在西南联大读书的 3 年间，尽管许多名教授衣衫褴褛，课室都是破旧的茅草房，但联大教授们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学养，学校自由活跃的学术氛围，让郑哲敏受益终生。

1946 年，抗战胜利后，郑哲敏来到清华大学，在这里，他拜在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门下。

郑哲敏：“钱伟长是我的启蒙老师，钱先生那时刚从国外回来，他在机械系开了一门课，是给我们四年级学生开的，叫近代力学课，包括弹性力学以及一些流体力学和其他现代力学知识，我们机械系的人数学功底不好，学得很吃劲。但钱先生讲得很吸引人，他介绍自己在美国的工作，火箭原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毕业后，郑哲敏留校给钱伟长先生做了一年“工程力学”的助教。

1948年暑期后，经过几乎是千里挑一的遴选，郑哲敏成为“国际扶轮社国际奖学金”全国唯一一名获得者。入学著名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一年之后，师从钱学森攻读博士学位。

郑哲敏：“钱先生当时在美国已经很有名气，《时代》周刊登过关于他的特别报道和照片，连美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人。1949年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成立了两个喷气推进中心，一个放在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放在加州理工学院，两个中心都请钱学森做主任，钱先生最后决定回到加州，所以我见到他是1949年。”

1955年，郑哲敏和钱学森师生二人回到祖国，在随后的50多年里，师生俩一直“如影随形”。他参加了钱学森先生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作为钱先生的助手，协助钱先生制订了中国力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在钱先生指导下，郑哲敏创立了爆炸力学这一崭新的学科。1984年2月，继钱学森先生之后，郑哲敏担任了中科院力学所第二任所长。1980年，郑哲敏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94年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哲敏阐明了爆炸成形的机理和模型律，解决了火箭重要部件的加工难题，为中国火箭上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发展了一门新的力学分支学科——爆炸力学。他长期主持力学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倡导建立了多个新的力学分支学科。

在地下核爆炸效应的研究中，郑哲敏与合作者一起提出了流体弹塑性模型，为我国首次地下核爆当量预报作出贡献。他带领团队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律、破甲机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为我国相关武器的设计与效应评估提供了坚实的力学基础，改变了中国常规武器的落后状况。他还开辟了爆炸加工、瓦斯突出等关键技术领域，解决了重大工程建设中的核心难点，为国家解决了一批重大实际问题。

郑哲敏从来都是以国家重大的急迫的需求为选题方向。做雪中送炭，爬坡出汗的工作。

郑哲敏把这些归功于自己的两位人生导师——钱伟长和钱学森先生。

郑哲敏：“他们教了我很多科研精神、研究方法和做人的原则，让我终生受益。”

郑先生现在依然亲自带博士研究生，依然在思考中国科学未来的发展。

老人喜爱音乐，尤其是德国古典音乐。

# 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小麦专家

李振声 山东淄博人，2006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它的授予对象是“取得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该奖从 2000 年创立以来，每次均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颁奖。

2006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颁给了一位农业科学家，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小麦专家李振声。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李振声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奖状。

这一年，李振声 76 岁，也是他从事小麦研究的第 55 个年头。

李振声，面目清癯，腰杆挺拔，待人温文尔雅，镜片后的慈眉善目中，时而闪出睿智的光芒。

像许多科学家一样，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人，为了接受记者采访，他会早上 5 点起床，准备大量资料，仔仔细细输入电脑。

李振声的名气远不如袁隆平大，但实际上中国的农学界早就有“南袁北李”的说法。在中国北方农村的老百姓中流行着一句话，要吃面，种小偃。说的就是由李振声培育的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的小偃良种系列。

55年的小麦研究经验，杰出的贡献，让李振声在农学界享有极高的威望。

其实，在这次获奖之前，李振声已在媒体上有过一次精彩亮相。2005年的博鳌论坛上，正是他代表中国农学界，对那些质疑谁来养活中国，质疑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声音做出了最具说服力的回应。



李振声：“2005年博鳌论坛有一个圆桌会议，这个圆桌会议的题目就叫‘中国和平崛起与亚洲的新角色’。这时候大会的组织者郑必坚同志约我去做一个发言，我觉得，如果到这个会上去讲的话，必然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莱斯特·布朗在十年前，1995年他出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谁来养活中国》，当时这本书出版以后，整个世界上引起很大轰动。他的问题是提出来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他真正的答案是中国不能养活自己。我就给郑必坚同志说，我可能要谈一谈这个问题。”

当年，莱斯特·布朗以1950年到1990年，4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以及粮食生产、消费等数据作为论据，写成了《谁来养活中国》。事实上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李振声就开始收集中国农业发展的点滴数据，整理相关资料。十几年后，他得出了与莱斯特·布朗截然不同的结论。

李振声：“他三个估计不足，第一，人口多估了1/3；第二，耕地少估了1/3；第三，中国科技的进步，对农业生产所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我就算了这15年，到2004年，我们国家粮食进出口数量基本持平。所以我就断定他这个是不对的，《科学时报》全文登了。中国农业发展的事实告诉世界，中国能自己养活自己。”

中国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这就是在2005年的博鳌论坛上李振声告诉全世界的事实，而这份自信，即是来自中国农业十几年来发展的事实，也是来自他对中国农业的深刻了解。

但就在他结束博鳌会议回到北京时，接机的女儿臂上带着刺目的黑纱。原来，

就在李振声在博鳌会议上发言的那一天，他的老伴不幸病逝。李振声忍着悲痛说，老伴一辈子都在默默支持他，这次她也会理解他的。

60多年前，农家子弟李振声走进了农学院的大门，一个简单不过的原因，就是为了养活自己。

李振声：“我准备到济南去找工作，看到山东农学院有一个招生广告，那是1948年的时候，解放了。这个招生广告里面非常吸引我的内容就是，提供住宿和吃饭的条件，所以我就去报考了。”

1984年，17岁的李振声考进山东农学院，这个从小饱尝饥苦冻馁的农村少年，很快就对农学研究、尤其是小麦育种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李振声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工作，在那里接受了早期的科研训练。1956年，为响应科学院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他和另外13名同志，一起调往位于陕西杨凌地区的中科院西北生物研究所。而这个时期，北方冬小麦产区正遭遇严重条锈病害影响。1950年到1951年，仅一年就损失小麦60亿公斤，占到了全国粮食总量的 $1/20$ 。对此，周恩来总理特别做出指示，要像对付人的癌症一样抓小麦条锈病。但是，在当时要解决条锈病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病菌变异的速度超过了人工育种的速度。一个新的病菌小种产生要五年的时间，但人工培育出一个新品种却要用八年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振声独辟蹊径，选定了抗病性很强的长穗燕麦草与小麦杂交，进行小麦远缘杂交的研究。

李振声：“这个远缘杂交实际上和常规的小麦杂交不同，它分为两段，第一，我们把它叫做创造新类型。第一步先把草的抗病基因转移到小麦里来，这里面有这么多困难，比如说第一个杂交，就不容易杂交成功。第二，杂交以后，杂种后代不育，这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困难，就是没有估计到，草和小麦杂交以后，草的遗传能力非常之强，它的后代非常像草。所以一次杂交不行，要第二次再用小麦对这个杂种杂交一次，这个还不行，还要做第三次杂交，在后代里面才能分离出来像小麦的东西。”

远缘杂交品种的培育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从1956年到1964年的8年时间里，李振声的研究进展缓慢，始终拿不出像样的成果。上上下下的噪音越来越多，一些本来就不看好的人，现在更有话说了，在舆论压力之下，李振声的研究几乎被叫停。

### 【画面】陕西省武功县杨凌公社关村大队小麦实验田。

陕西省武功县杨凌公社关村大队成了李振声的福地，1964年，也就是在李振声研究杂交小麦的第8年，李振声绝处逢生，奇迹终于出现在了这片土地上。

李振声：“我们已经培育了很多杂种，差不多有1000多份，各种各样的杂种。1964年，就是我这个远缘杂交做到第8年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气候条件，就是小麦成熟之前，连续40天阴雨。到了6月14号，天气突然暴晴。很多小麦一天之间都青干了，可是就在我的田地里面，出现了一个杂种，它没有青干。所以，在这种非常严酷的条件之下才能筛选出来真正远缘杂交里面最有用的东西。”

麦地里两株没有被青干的杂交种，给了正处于困境中的李振声莫大的信心，事实上也正是这两株麦子，成就了他10年后的伟大成功。然而就在李振声为刚刚得到杂交新种欣喜不已的时候，他却得到通知，和其他几个“臭老九”一起到农村蹲点，接受劳动再教育。

### 【画面】宝鸡县宁王公社联合大队。

宝鸡县宁王公社联合大队在李振声的科研生涯中有着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在这里，他度过了4年时光。

李振声：“我们是12月份去的，大家一起看麦田，进行麦田检查。当时分了三类田，最好的是一类田，二类田、三类田。然后把11个生产队，每个队的一、二、三类田的比例做了统计。就发现两个队，一个是七队，一个是一队，三类田的比例很大。当时我们就提出一些加强管理，施肥灌水的建议。结果这个七队很好，它把这个措施都用上了，一队因为比较远，不太重视。第二年这个七队增产了，一队减产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刚好就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开现场会，大家来观察。所以到了秋播的时候，我们这个麦田全部推广七队的经验。”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农民的认同给了李振声最大的支持。当时他是联合大队里头最吃得开的“臭老九”，随着小麦田间管理的逐渐推广，李振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身份从开始的大队顾问，做到了陕西省农业顾问。

1979年让他煞费苦心，苦熬了23年的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取得了最后的成功。杂交品种小偃4号、5号、6号，具有其他品种所没有的持久抗病性和高产优质

的特点。其中小偃6号最为突出，被陕西省作为骨干小麦品种，持续种植了16年。在全国的推广种植面积达1.5亿亩，累计增产小麦80亿斤。另外小偃6号还被选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骨干亲本之一，以它为基础先后育成了53个小麦品种。这些品种累计推广面积3亿亩以上，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78年，小麦远缘杂交项目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20世纪80年代初，在远缘小麦杂交取得成功的同时，李振声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成果，蓝粒小麦单体系统也获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认可。1986年正因为李振声的这项国际首创性的研究，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在中国的西安举行。李振声主持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后不久，56岁的李振声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协助时任院长周光召管理生物局和农业项目办公室。当时，我国的粮食生产出现连续3年的徘徊局面，但人口增加了五千万。怎样解决粮食问题，再次成为高层领导关注的重点，刚刚上任的李振声，再次被推到了解决粮食生产问题的第一线。

李振声：“当时连着3年没有增产，国家就急于找到一个突破口。这时候我来了以后，找了科学院的一些做农业的专家，一起来做调查研究。我们差不多花了3个月的时间，就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看法。最初的这个是在河南封丘科学院的试验站，通过中低产治理明显地增产。封丘县是一个中等县，通过中低产田治理，能够增产两亿斤，当然我们不要那么多，我们按一个县增产一亿斤，黄淮海地区500个县，那就是500亿斤。”

李振声提出了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方案，并组织中科院25个研究所400多名科研人员深入黄淮海地区，与地方科技人员合作开展了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工作，被称为农业科技领域的淮海战役。

经过6年的艰苦治理，到1993年，黄淮海地区粮食增产504.8亿斤，与原来预计的增产潜力完全吻合，黄淮海治理取得了重大胜利。也使我国在1993年以后的5年时间里，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从20世纪50年代研治条锈病害开始，到90年代参与黄淮海中低产田的治理工作，李振声亲身经历了中国粮食生产的几起几落，正是凭借着对中国农业的深刻了解和对这片土地的无比热爱，在2005年的博鳌论坛上，李振声才能够如此自信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事实。

今天，已经 83 岁的李振声仍然关注着我国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点滴变化。从青年时代养活自己开始，到晚年关注整个国家的粮食命脉，李振声的一生与粮食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在小麦里干出了大事业的人，有着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盛誉的李振声处事却非常低调。埋头工作，不事张扬。起初，记者采访他被一口拒绝。他说，你采访我干什么，我就是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不想宣传。好话说了一箩筐，才有了这次难得的采访。

李振声的好脾气是出了名的，近距离接触，你会感到他实在是一位可爱可敬的山东老头。

## 在西部放飞理想

陈秋林 山东济宁人，西安万隆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对于大批涌入中国的西方旅游者来说，没到西安就等于没来过中国，被称做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以及半坡遗址、大雁塔、临潼华清池、碑林等一大批代表着中华文明灿烂文化的瑰宝使这座古城享有独具的风采与魅力。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安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高新技术开发区更是成为这座古城一道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最近，西安被国际权威组织评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六座城市之一，作为西部大开发龙头的西安掀开了它历史上最为灿烂的一页，而西安人也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辉煌。

西安高新区长安科技产业园是西安近几年崛起的又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了保证进入园区的项目必须是真正具备高新技术含量，园区在项目引进中设置了很高的门槛。

今天，著名学者、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汉宁教授来科技产业园进行视察调研，他选择了最早进入产业园，同时也是正式投产的第一家企业西安万隆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这家公司是一个民营企业，它们即将推出的产品加替沙星是

国家一类新药，对于医药制造行业来说，拥有一类新药意味着它们具有了很强的市场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后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西部的人才大量流失，高新技术的引进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且，观念的差距更是成为制约西部发展的严重障碍，导致妄自菲薄、自甘落后情绪的存在。

作为一位熟知宏观背景的省人大常委，一位思路开阔的著名学者，吴教授对于眼前看到的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当他了解到企业独特的发展思路时，他欣喜地感到在西部企业家身上，正在产生西部追赶东部最需要的那种观念的变化。西部的企业家就要有那种冲出西部、占领东部发达地区市场的雄心，就是要敢于抢占争夺高新技术的制高点。只有如此，西部才能尽快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实现西部大开发的宏伟战略目标。

吴汉宁：“陕西是一个教育大省、科技大省，它的高等院校、大学很多，全国知名的大学就有五十几所，成规模的科研院所有3000多个，技术力量是相当雄厚的。但是值得担忧的一个问题是，陕西的人才外流、技术外流比较严重，当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这个问题有所好转。那么万隆制药公司把自己在陕西生长出来的技术，留在陕西开发，而没有把这个技术放到外省去开发、生产，也没有把技术转让给外省，我觉得这是我们陕西企业应该借鉴的。”

陈秋林是西安万隆制药责任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像许多成功的年轻人一样，自信、敏锐、练达。

#### 【画面】陈秋林在公司会议上。

陈秋林：“它后面推出的大块的产品没有，我们也感觉比较奇怪。那么大的厂子，它广告费每年要花几千万，但它不舍得去买产品，这就是它的缺点、它的弱势，没有拳头产品，它把品牌打出来了，没有相应价值的产品去支持它，那么前面的品牌等于是一种浪费，这几年花的广告费，等于是一种无形浪费。”

陈秋林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下海的那批人中的一员，那时他做服装生意，这段商海历练让他学会了许多东西。



陈秋林的祖父是中医，他的父亲承袭了祖父的衣钵，也是一名老医生。这位一口地道的山东腔，性情豪放、急公好义的老人在西安城颇有些名气。在生意场闯荡了几年的陈秋林，后来听从了父亲的劝告，丢下生意到陕西中医院苦读数载，也做了一名医生。他跟着父亲在全国各地四处巡诊，用祖传医道为许多患者解除了病痛，受到了病家的广泛欢迎。这时，陈秋林的经营头脑发挥了作用，他开办了一家中药厂，生产祖传的乌龙驱白散。这个药厂在经历了几年的红红火火之后，因为全国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企业发展的速度趋于减缓。

陈秋林：“当初我们中药厂的产品比较老化了，通过几年的市场之后，销售量也在逐渐地下降。当时我们就研究，是这样走下去呢，还是换一个思路，另外再走一条路，比如在西药方面开发。正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介绍，有一个开采石油的人想进入制药领域，而且想买断我们的药厂。当时我们就研究这个事情，外行要进入这个行业，那么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对我们这个行业都没有信心，人家外行却有这样的信心，道理是什么。”

带着思索，陈秋林和一群探险者一起，走进了新疆罗布泊大沙漠。

在陈秋林的性格中有着强烈的冒险成分，喜欢在征服与被征服的较量中体味生命之美，他不屑守成，拒绝平庸，渴望搏击，渴望登攀，寻求不断超越自我。

陈秋林：“如果上的话，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小马拉一个大车，走到一半如果资金跟不上去了，就意味着这个车就要翻掉，那样死下来是很惨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全体人员开会来定夺这个事情，大家讨论了好几天，谁也不好下这个决心，这个风险确实非常大。这个时候我们盘算，如果不去做，这个行业我们永远就失去了，这次机会就失去了，因为这期间全国正在搞GMP认证，药厂都在改造，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错过去的话，以后你就不可能再进入这个行业。”

面对摆在面前的抉择决心实在难下，巨大的投资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失误，多年奋斗的事业可能毁于一旦。

陈秋林：“通过大家研究，最后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包括跟夫人商量。夫人说你也别费这么大的神，冒这么大的风险。我把原来住的房子卖掉，新的房子抵押，包括我的车，我们王总的车都卖掉，这样我先拿到了一部分启动资金。”

陈秋林下定决心放手一搏的时候，西安高新区长安科技产业园还是一片荒地，没有多少企业对这里有多大兴趣。

陈秋林却决心把自己的新工厂的厂址就放在这里，因为他感到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方针已经确定，国家一定会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此时不入园更待何时？

岳利敏（西安高新区长安科技产业园副主任）：“当时开始做的时候，我们规划设计的是非常好，但实际的情况，还是一片荒地。我们只做了一些最基本的道路建设，但当时入区的企业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园区当时规划设计的还是比较高的，但这种设想还不完全被外界所认识，万隆制药公司能进我们长安园，我们认为他们的老板还是比较有胆识的。今天反过头来看，万隆作为第一批进入我们园区的企业，确实是选对了地方，对这个项目，我们也觉得我们选对了。”

因为是最早进入园区的高新企业，西安万隆享受了产业园的非常优惠的政策，企业因此得以在土地使用等初期投资不必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土建和设备安装。

陈秋林：“对西安周围有些做得比较好的药厂，我们也在观察。他们近几年在发展上也在去想办法，有些厂拿出几千万按照GMP的标准搞了药厂的改造，又花几千万把老的产品新做，做完之后打这个广告。我感觉到他们没有在新产品开发上花几千万，甚至几百万，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入手点，我们就冲着这一点，就去找别人没有找的这个点，发挥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现在也去跟人家拼规模，拼广告和品牌，我们显然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内精选出了优质的优良的好产品，形成一个产品群，那这为我们将来立足于这个行业，树立我们的品牌是大有益处的。通过一年两年三年的努力，我相信最终能站到最后的应该是我们。”

陈秋林的思路就是改变西安的人才、西安的技术孔雀东南飞，外流到东部发达地区的状况，在利用好本地区人才技术资源的前提下，面向全国在新产品开发上投以重兵，从而形成一个新产品群，以此迎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乃至常胜之地。

不敢承担巨大风险的人很难做成什么大事，而成就大事仅仅靠冒险则也是远远不够的。有胆还要有识，有勇更要有谋。

#### 附记：

时隔12年，我们再一次来到古城西安。

西安的变化是巨大的，她变得更加风姿绰约，雍容华贵。

西安万隆的变化比之这座城市脚步似乎更快。

再见到董事长陈秋林，他俨然已是高尔夫高手，长年的户外运动使他显得结实帅气，似乎比当年更加年轻。多年的商海历练，在他身上留下的是自信内敛和沉稳。

如果把西安万隆比做一列呼啸前行的火车，这列火车已从蒸汽机车变身为高速列车。无论是规模和企业品质，与上次采访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公司目前已形成了抗感染类、心脑血管类、营养液类三大系列为主导的产品格局，销售网络遍布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公司营业额2010年为1.76亿元，纳税2750万元。2011年营业额为2.29亿元，纳税3550万元。2012年营业额2.98亿元，纳税4500万元。2013年营业额为3.87亿元，纳税5000多万元。销售额一直保持3%以上的年增长率。

企业的高速发展，源于企业发展战略的前瞻性。

西安万隆在新产品的研发上可谓不遗余力。

作为陕西省首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西安市政府批准的最具高新技术研发实力的研发平台，西安万隆制药拥有60多人的研发队伍。公司依托中科院药物研究院、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沈阳医科大学等国内20多家著名药品研发机构的合作，累计投资6000多万元用于产品研发，完成了19个药品品种的开发，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新药证书11份，其中包括一类新药2项，三类新药1项，药物制剂方面的技术创新发明专利8项。

公司秉持“奉献优质产品，造福人类健康”的企业宗旨，注重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公司荣获陕西省慈善协会慈善事业突出奖，荣获西安市高新区“最具自主创新能力企业”“生物医药10强企业”，中国质量管理中心“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全国市场质量信用AAA级企业”等荣誉称号。

为了适应快速发展的大好势头，2011年在杨凌示范区征地300多亩，建设西安万隆杨凌生产基地，预计总投资7亿多元，按第五年达产100%预计，销售收入可达29亿元，纳税4亿元。2013年，这一项目被列入陕西省重点建设项目，获得1400万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

公司有望于近年于创业板上市，届时西安万隆将插上腾飞的翅膀，向着更加远大的目标加速前进。